

冯骥才将近二十年的演讲合集。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李 辉

时间过得真快,没有想到认识冯骥才先生超过三十年了。找到他送我的第一套书《冯骥才选集》,时间为1986年7月7日。我们熟悉后,不再叫冯先生,而是叫“大冯”,一直叫到今天。

站在冯骥才面前,个矮的我们,只能仰视。如果合眼,悬殊更大。这位个头高大的人,喜欢运动,曾是篮球队员,可是,他却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艺术门类之中。从开始画画,居然一次又一次临摹《清明上河图》,那可真是下不一般的功夫。他喜欢收藏民间大大小小的物件,从而奠定后来全身心投入文化保护的扎实基础。当然,对于他,最大的是文学诱惑。这一诱惑,在十年“文革”期间鬼使神差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令他无法抗拒。

冯骥才1942年出生,1966年“文革”爆发时,24岁的他与顾同昭大姐结婚。新婚之际,未曾预料的风暴就来了。五十年,他们相濡以沫,在风云变幻中走过。去年,2016年,他们步入金婚,收到他们夫妇赠送的《金婚图记》。翻阅图记,两个大家庭在天津的风风雨雨,依次展开……

动荡岁月,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感促使冯骥才开始偷偷记录。他无法抗拒!身处浩劫之中,他清醒意识到他们这代人,需要以不同方式记录现实发生的一切,为了现实不被遗忘,更是为了留存历史。

1975年前后,大冯写了一系列诗歌,其中那首《路》,四十年后再读,仍然令人感动。冯骥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路。一走,就是五十年!

的确,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他应该做什么,可以走多远。从小说创作到非虚构写作,从个人收藏转而在全国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吁保护古村落等,冯骥才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爱之深痛之切的隐忧,令他不能放弃个人责任,不能让文化脉络在这一代人手里断裂。他敏感焦虑,他四处呼吁与演讲,他走进田野考察……

冯骥才走上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我们看路上精彩的人生风景。

冯骥才是一位有历史感的人,故而他的笔下总是呈现沉甸甸的历史真实。

他的《铺花的歧路》,与诸多“伤痕文学”作品一样,写一位女红卫兵白慧因失手殴打一位女教师的往事,未曾想到的是,她后来结识的男朋友常鸣,不巧就是这位教

师的儿子。内疚、悔恨、悲痛,一直折磨白慧,她永远无法摆脱……

与冯骥才后来创作的《雕花烟斗》《神鞭》《三寸金莲》《炮打双灯》等小说相比,长篇小说处女作《铺花的歧路》的故事叙述能力,他对一代红卫兵内心伤痕的描写,今天再看,依旧有历史沉重感。

《铺花的歧路》从校园批斗,到上山下乡白慧与常鸣的医院偶遇,再到海边沙滩上的最后拥抱,白慧与常鸣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我想,这是冯骥才在叙述历史真实的同时,希望给予这一代年轻人痛定思痛之后的一种温暖,这种温暖,会让他们重新感受生活的厚爱,珍惜生命,从而赋予他们继续前行的力量。这部小说创作将近四十年,再读之,仍然感动以文学叙述历史真实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力量。

从《铺花的歧路》开始,对历史的叩问,从来没有离开冯骥才的视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非虚构的“口述历史实录”《一百个人的十年》。

“口述历史实录”最初盛行于欧美。1983年,毕朔望先生组织一批译者,翻译美国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作品,以《美国梦寻》为书名出版。在缀语里,毕朔

望呼吁中国的作家,不妨向特克尔学习,也从事这种“口述历史实录”的方式,留存现实与历史。《美国梦寻》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诸多读者和作家的关注。率先采用“口述实录”形式开始记录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分别是冯骥才、张辛欣与桑晔。

1984年,张辛欣、桑晔两人合作,四处寻访、记录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第二年开始,在不同期刊上陆续发表,然后结集为《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叙》出版。冯骥才的努力成功地将之引入到挖掘历史记忆的写作领域。

冯骥才几乎也在同时,开始以“口述实录”方式,借不同人的个人记忆,为“文革”历史留下群体印象。这些口述实录笔下的人物各行各业都有,叙述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拾纸救父、崇拜的代价、伟大的受难者、我到底有没有罪、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年、失踪的少女、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忏悔录……正是这种方方面面的叙述,十年“文革”的历史更为丰富,更为立体。可以说,其历史价值和人性呈现,不可代替。

这些口述实录,1986年开始在

《收获》《当代》等期刊上陆续发表。后结集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第一集1987年出版。距今,正好出版30年。

口述实录的采访过程,也是冯骥才再次亲历“文革”历史的过程。从不同谈话对象那里,他深深感受到对他的信任。他为之感动,从而意识到手中之笔的分量何其之重。他知道,自己不能辜负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对他的信任。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他们倾诉的亲身经历写下来,既是为他们,更是为自己,为历史。

冯骥才的确没有“放弃这使命”。二十多年后,他相继完成非虚构作品《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凌汛》《地狱天堂》等。在这些作品里,他叙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浩劫,叙述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辈编辑们之间的场景……在他的笔下,诸多历史细节丰富记忆,为历史存照。

历史叙述的魅力就是如此诱人。人们阅读之后,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重温记忆,走进历史深处。非虚构作品的力量,就在于此。

将近二十年的演讲,冯骥才将之分为三个阶段:2001年至2006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冯骥才演讲集(2001-2016)》,冯骥才著,大象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定价38元

年,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普查的启动阶段;2007年至2011年,民间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护阶段;2012年至2016年,是“非遗”后和古村落抢救性全面普查开始的阶段。

一次又一次的演讲,成为从花甲至古稀之年的冯骥才,另外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

今年,冯骥才步入七十五周岁。他不会放弃已经选择的路。在这条路上,他仍将继续前行!

一个理解与构建现代中国大学的新思路。

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沈 群

本书以历史性还原现代中国大学的传统文化性格为旨趣,试图厘清与论证这样一种关系,即传统中国文化一直是与中国大学以一贯之的内容。该书开宗明义指出: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大学在本质上并非只是横向移植西方大学模式的一类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于一体的社会机构,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区别于任何其他国家大学机构的文化实体。作者认为,植根于传统文化,百年来中国大学虽经历过仿日、学美、效法、学苏几个阶段,有的阶段甚至处于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中,但中国大学始终在许多方面保持有其之为中国大学的民族文化特征,即“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作为一个理解中国大学百年民族文化特征的概念架构,“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是作者对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中国大学关系的理论表述。金耀基在阐述大学与中国现代文明时,谈及古今中国大学之道。他认为,传统中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至善是其终极目的,指向一个有道德、伦理的文明秩序;

现代中国大学取法欧洲,大学之道在明明理,在新知,在止于至善,至善成为今日之大学的终极目标。基于对历史与现状的分析,金耀基指出“今日之大学之道必须与传统中国大学之道兼重并举”,充分肯定了中国大学古有传统的现代价值。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梅贻琦就已论及中国大学之道。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就指出:“今日之大学教育,骛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查,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不力耳。”可以说,百余年来现代中国大学作为“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虽是公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大学的关系却从未也不可能被否认。

该书以“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为此一主题重新命名,通过把本意属人的“性格”概念赋予大学,并直接与“文化”结合起来,更生动地表达了对中国大学根本特征及其特殊性的认知,对“纵向的移植”外表述中国大学之为中国大学实质的把握。相比于已有研

究偏重于构建一种回归与重建理论的叙事传统,作为一个中国大学传统文化属性的解释性研究,该书主要聚焦于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本身,凸显的是现代中国大学传统文化特征发展演变的历史整体性与连续性。作为一部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专著,无论是关于历史性描述还是理想性构建,该书都做了颇有价值的探索。

首先,在研究思路设计上,该书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机制“中国文化——文化传承者”——“中国大学”为分析框架,创造性的构建了一个以传统文化为根本出发点的中国大学解释框架。其中,所谓的“文化传承者”,在书中特指连接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的桥梁,是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实践主体,对传统文化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中国大学起着决定性作用。以中国文化、文化传承者以及中国大学为基本点,该书在梳理、分析和归纳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变迁中,不仅注重对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

的社会背景的描述;更注重对“活着”的中国文化,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实践主体——“文化传承者”所持有的文化观念与中国大学观念的分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典型特征的归纳;还涉及对各历史时期中国大学具体理念、制度以及物质符号的文化解释。

其次,在论证与分析的过程中,该书以韦伯的“理想类型”为研究方法,在中国大学百年的历史框架中深入刻画了中国大学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典型特征,尤其注重从传统经典中寻找合法性依据。书中指出,从中国大学诞生到清朝灭亡时期,中国大学主要为维护晚清政权而设,受晚清士大夫控制,文化性格最为浓厚,主要以“忠君尊孔”“学仕一体”以及“经学为本”为鲜明特征;整个民国时期,在民国大学校长的主导下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呈现出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态势,表现出“厚德载物”、“有容纳大”、“文实并包”以及“天下为公”等典型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正在酝酿与形成一种理想的可能

性模式——“中国的中国模式”,并且初步呈现出了“以人为本”、“人文立身”以及“宁静致远”等较好的文化发展趋向。以上对各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诸多表征的抽象提炼与概念表达,是作者基于对于历史文献、经典文本的解读,对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大学特征理想化提取的结果,它们集中表达了所处历史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整体性特征以及阶段特殊性。

再次,基于对历史的省思以及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忧思,作者尝试性地构建起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模型。书中指出,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之构建涵盖了回归古典大学之道、复兴传统人文知识以及协调好大学、学者与政府三者关系等多重内涵,尤其强调了实践过程中自由学者之于理想大学文化性格构建的重要性。立足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意义上分别阐述了优质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及各按其职、相互协调的大学、学者与政府作为影响理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构建的基本性要素,之于现代中国大



《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贾佳、王建华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定价49元

学建设的现实意义。该书关于理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探究,在理论上将经验性的历史、现实与逻辑性的理想构造统一起来,并依靠经验性的历史与现实把握到未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实践逻辑,充分表征了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内在特征的连续性与外部条件的制约性。

台湾地区艺术史论界的一座高峰——傅申。

艺术鉴赏的重建与复兴

■徐莫非

在古代讯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于艺术品仅属少数人珍奇宝贝之奢侈品,所以一流的书画鉴赏大师历来就是极为稀缺的特殊人才。随着近代影印技术的发展,加上清宫秘府藏品的外流以及开展览活动的普及,使得书画爱好者更方便观摩到历代艺术珍品。那些有着传统功底的学者便如北冥之鱼,化为鲲鹏,一时涌现出不少鉴赏大家,特别是八十年代全国文博机构数万件书画藏品的巡回鉴定工作,又让七人小组的眼界与水准大为提升,同时也谱写了一段艺术史上的佳话,可以说古今以来,几乎举世无双。而与之相对应的,台湾地区丰富的书画藏品也造就了一座高峰,那便是艺术史论界所熟知的傅申前辈。

傅申先生美术系科班出身,拥有扎实的书画基本功,而立之后赴美深造,获博士学位,曾先后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耶鲁大学副教授、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

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等职,著述颇丰。近两年来,傅先生又受聘担任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并开设“中国书画鉴定与艺术史”系列讲座,前后达四十五天之久,又受邀至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鲁迅美术学院、吉林大学等地院校和科研机构巡回演讲达三十多场次。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浙江出版集团社将其中最重要的十二场演讲整理汇编成了这部《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巨著,书中涉及书画鉴定的基本要旨与方法,旧传黄公望作品《雨岩仙观图》的真伪、怀素《自叙帖》的重新鉴定,日本所藏五代、宋人书画的考辨、黄庭坚《砥柱铭》的分析、《富春卷》与《剩山图》相互关系的原委、董其昌与龚贤、前新安派之原委的内在联系等等一系列艺术史话题。傅先生思维缜密而论证雄辩,讲解方式又风趣幽默,使读者翻阅此书如同当面聆听受教,获

益匪浅,每讲末尾并有主持人及听讲者与傅先生的问答互动,可以进一步加深读者对于所讲议题的认识与理解。

此书的出版可谓正得其时,因为艺术事业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的协同发展,然而创作的兴盛与鉴赏的缺失常常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特别是当代艺术教育轻视书画史论人才的培育,以至于使艺术鉴赏成为一门封闭在象牙塔内的高冷学科。《历代名画记》中有云:“收藏未能鉴赏,鉴赏而不善阅玩者,皆好事者之病也。”龚贤亦曰:“作画难,而识画尤难,天下作画者多矣,而识者几人哉!”由此观之,好事者沉痾难医,艺术鉴赏重要性亦亟需重新认识。比如,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艺术史中声明赫赫的“顾、陆、张、吴”与“荆、关、董、巨”,其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张彦远和郭若虚二人的品评。不过傅申先生也说到书画鉴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历代鉴赏大师如华衞

钺般的褒贬增削,其基础都源自烂熟于心的艺术史知识储备与洞若观火的书画理论素养,张彦远自称“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王微则说“吾性知画,盖鸣鹤之机”。除了这些必备的专业技能外,还当通晓文学、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旁及服饰、建筑、音韵、材质等诸多学科,其难度可想而知。古人又云“要明跋尾印记,乃是书画之本业耳”“精通者所宜详辨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踪,然后可议乎画”“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非夫神速识高、情超心惠者,岂可议乎知画”等等,亦可见门槛之高。而曹植提出的“有南威之容,方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更是要求艺术鉴赏家首先具备一流的创作能力。传之当今,讲习艺术者愈众,而具备以上功力者几为凤毛麟角。

诚如傅先生本书中最后一讲中所说,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虽然“古人学问无遗力”,但受限于匮乏

的讯息环境与落后的技术手段,书画珍品总是“可遇而不可求”。晚清民国至解放初,拥有雄厚文化根基的学者迎来了历史性的成长机遇,因缘际会,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时期内群峰并峙的罕见盛况。可惜繁华易逝,七人小组五人作古,文化传统的断层与完全功利化的市场导向使得后来学者内心渐趋浮躁,尽管当今进步的印刷技术与完备的博物馆、图书馆体系使我们拥有极为丰富的图像资源与唾手可得的文史资料,如此殊胜的机缘环境却未能造就新的巨匠大师,其内在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最后,建议凡有志于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学人,购藏这部著作,《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可与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谢稚柳《中国书画鉴定》《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刘九庵《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傅熹年《傅熹年



《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田洪、颜晓军、徐凯凯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定价168元

书画鉴定集》等名著一并研读学习。“无舆马无以致千里,微舟楫无以绝江河”,君子“善假于物,方能造极”,相信傅先生此书亦如破晓指路之明灯、潮流巨擘之津梁,助益后来学者,顺利登岸。